

西賽羅《理想的演說家》中的記憶拼圖與國族想像

蔡仁傑

Intergrams 13.2(2013):

<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132/132-tjc.pdf>

ISSN: 1683-4186

摘要

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在其政治生涯最高峰時(獲選古羅馬的執政官(63BC))，卻同時面臨卡提里內(Catiline)的謀叛。隨後即在種種政治衝突中於58BC被迫展開流亡生涯。次年，放逐令撤銷，但政治情勢仍不樂觀，羅馬共和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西賽羅於55BC寫下《理想的演說家》(*De Oratore*)，希冀書中所刻劃的理想演說家能成為羅馬的精神(乃至政治)導師，帶領羅馬人度過共和危機，重返屬於羅馬人的榮耀。就此，他訴諸兩大記憶區塊以形塑演說家的圖像：其一為他對克拉賽思(Crassus)與安托尼斯(Antonius)兩大演說家的回憶，於書中透過他們的(想像)對話揭示何謂理想的演說家，設定時間為91BC，其時這兩位演說家也正面臨政治動盪；其二為對蘇格拉底(Socrates)的回憶，在對話開始前，另一(次要)與談者史該摩拉(Scaevola)向克拉賽思說道：「既然您這邊有一株懸鈴木(plane tree)，那我們為什麼不學學蘇格拉底在柏拉圖(Plato)《費德魯斯篇》(*Phaedrus*)中臥躺在此樹下暢談呢？」綜合言之，對於前者的回憶，除了是對於偉人的緬懷，也是西賽羅的自我投射——其演說術中以人為中心的內涵是他當代修辭學教科書中制式的規則遠遠無法觸及、而喪失說服術的淑世功能；對於後者的回憶，則隱含著哲學修辭的倡議，期待演說家的話語總能奠基在知識上，帶領聽眾走向正確的政治決定，這也是他當代修辭學教科書所匱乏的。然而，拼湊這兩大記憶區塊並非天衣無縫，因為上述兩大記憶版圖的消長其實背後指涉了兩種記憶模式，一是屬於蘇格拉底辯證法的回溯術(anamnesis)，一是修辭說服術中的(空間)記憶術(mnemonics)。本論文因此旨在探索《理想的演說家》所隱含的這兩大記憶驅力間的交涉如何脈絡化克拉賽思與安托尼斯之間的對話，並指出西賽羅如何挪用及合成這二股驅力於理想的演說家，以及此演說家所對應的國族想像為何。

關鍵詞：西賽羅、《理想的演說家》、記憶、修辭、知識

Memory and Nationalism in Cicero's *On the Ideal Orator*

Jen-chieh Tsai

Abstract

At his peak of political career (elected as consul in 63BC), Cicero nevertheless meets with Catiline's conspiracy. Amid a sequence of political conflicts that follow thereupon, he is forced into exile in 58BC and political prospects remain somber to him even though his exile gets revoked the next year. The Roman Republic is thus placed in a precarious situation. It i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at Cicero composes his *On the Ideal Orator*. He hopes that the ideal orator as depicted in it can be a mentor for the Romans and guides them through the jeopardized Republic—to retrieve the glory particular to his fellow men. In his work, then, Cicero appeals to two memories. One concerns his reminiscence of the two great orators, Crassus and Antonius, whose envisaging of an ideal orator is revealed in the (imaginary) talks in the text. The time is set in 91BC, when the two orators also face political storms. The other concerns his reminiscence of Socrates: before the talks in the work begin, Scaevola suggests to Crassus that they take the example of Plato's *Phaedrus* and start their discussion under a plane tree just as Socrates does. In a nutshell, the first memory indicates not only Cicero's homage to his forefathers but also his self-projection onto the image of the ideal orator—implying that the technical rhetoric as taught by his contemporaries is too formalistic to ameliorate the then Roman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cond memory points to the advocacy of philosophical rhetoric—knowledge-based speech, which is also missing in his contemporary rhetoric. However, taken together, the two memories do not form into an organic whole all because they refer to two modes of memorization that have long been set against each other: the mnemonics in rhetoric and the anamnesis in Socratic dialectic.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contextualize the talks between Crassus and Antonius in the two modes of memorization. It is hoped to see how the two modes are compounded in the image of the ideal orator and to what national identity that image corresponds.

Keywords: Cicero, *On the Ideal Orator*, memory, rhetoric, knowledge

一、前言

我來談談那萬能的藏寶屋——記憶——好嗎?很清楚的,除非這項能力被當作守衛者來使用,以確保我們為演說內容仔細考慮而得的想法及字眼不至於有疏漏,否則,縱使演說家的眾多本領再怎麼超群,都將是枉然。

——西塞羅,《理想的演說家》(1.18)

這段引言來自西賽羅(Cicero)《理想的演說家》(*De Oratore*)(下稱《理》)第一部對話中的序言,他在此主要是感嘆為何綜觀古今真正的演說家如此難以尋得,而解釋道,原來(真正的)演說家所具備的能力是「更為宏大的」並且是「較想像中更多技藝與事務的綜合體」(1.16)。西賽羅進一步羅列諸多形成演說家的特質,引言中的「記憶」即為該清單的最後一項,指的是演說家在完備演說內容後須強記之,方能無所遺漏的將精心構築的說服話語施展開來。在古典修辭傳統中,此記憶意涵的當然就是記憶術,重點在於技巧,但或許因偏向實際的技術操作,傳統上的論述並不多,篇幅也少。¹然而,置放在《理》中,記憶有其獨特的脈絡意義。首先是西賽羅所論之記憶及其他特質,在修辭體系上,可謂是一大革新,將傳統的技術導向討論拉至以人為中心、非自動裝置(automaton)的觀照。這些特質的釋義便散佈在《理》的三部對話中,為該文本的核心議題。更重要的是,記憶隱喻了《理》的文本質性,因為西賽羅為文的思考架構恰恰植基於兩大記憶區塊:一為對克拉賽思(Crassus)與安托尼斯(Antonius)兩大演說家的回憶,一為對蘇格拉底(Socrates)的回憶。則,這兩個在哲學傳統上扞格不入的記憶區塊之關聯為何?其回憶理路又如何與修辭記憶術連結?而西賽羅於其背離當代的修辭論述中,所編織的記憶路徑怎麼形塑理想的演說家及羅馬認同?凡此皆是本文的研究問題,討論依序為:古典修辭傳統與西賽羅、西賽羅的背景及其修辭觀、兩大記憶區塊的分合、理想演說家的圖像評估。

二、西方古典修辭傳統與西賽羅

一般咸認西方的修辭學始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文化,在大希臘(Magna Graecia, 今義大利)的敘拉古(Syracuse)。據巴瑞里(Renato Barilli)的說法,在當時由於僭王特拉西布魯司(Trasibulus)被推翻,許多地主興起法律訴訟以追討在其暴政期間被褫奪的土地,而有法庭修辭(forensic),此亦為修辭傳統中一直為焦點的說服形式之一(3)。同時發展的其他形式的說服尚包括審議修辭(deliberative)及儀式修辭(epideictic),而有別於法庭修辭處理的是公正與否的問題,前者思考有利與否的行

¹ 修辭中的記憶術據傳是由希臘人 Simonides of Ceos 所創,但在此領域中的古典記述僅見於稍後提及的拉丁文本 *Rhetorica ad Herennium*、西賽羅的 *De Inventione* 及昆體良之 *Institutio Oratoria*。

動或決定，而後者以褒貶人物為主；這三種說服形式的區別雖有之，卻須等到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系統性介紹方有此等名稱及相關定義。如從學科建制的觀點，則修辭學據傳是由克拉克思(Corax)與其弟子提西亞思(Tisias)在敘拉古所創，他們的教科書流傳至雅典後，因著柏里克利式民主(Periclean democracy)的庇護，修辭學遂成為顯學(Kennedy 1980:19)。從敘拉古到雅典的傳播或有其真實性，甚至是象徵性(後來的詭辯大師高爾吉亞(Gorgias)及西賽羅都在西西里(Sicily)發跡)，但克拉克思和提西亞思的傳說性質較重，用沃可(Jeffrey Walker)的話來說，他們頂多是「朦朦朧朧的人物」(shadowy figures)(31)。

修辭學的熾盛年代，主要是由詭辯人士(sophists)或修辭老師所引領的，他們教導的說服話語容或有煽動性質(demagogic)、枉顧真實，而招致如蘇格拉底之士的不滿。例如，在柏拉圖(Plato)的對話《高爾吉亞篇》(Gorgias)中，蘇氏抨擊修辭學，指陳其因無相對應的知識(episteme)，而非一種技藝(techne)，畢竟語言是無法自我指涉的(454D)。後來的亞里斯多德則較務實的認可修辭學的必要性，他在《修辭技藝》(Art of Rhetoric)中，即從「理態」瞭解說服的運作，教導如何作出真正睿智的決定；為避免落入「不負責任的語言」(irresponsible language)(Olmsted 10)的缺失，他也特別提出「修辭推論」(enthymeme)的邏輯推演，以之形構論點的樣貌(1.2.13)。當中要注意的是，雖然亞氏認可修辭為一種techne，但techne於此已非奠基於蘇格拉底的「確定性」，而是「或然性」(亞氏其實也以或然性詮釋蘇氏的辯證法(dialectic))。

從上述可見，柏拉圖主義和亞里斯多德都企圖由哲學(道德)的觀點批判或轉化修辭的內涵，亞氏的《修辭技藝》卻不僅僅是哲學修辭的論述，它也是現存史上第一本針對技術修辭的系統化陳述。就此陳述，吾人可察古典修辭系統中關於論點形構(inventio)、論點編排(dispositio)、風格塑造(elocutio)等三大科目之原型。至於其餘兩大科目：演說記誦(memoria)及發聲操作(pronuntiatio)，後者為亞式弟子西歐弗拉特思(Theophrastes)所添加(Kennedy 1972:118)，前者緣起不詳，但可以確定的是，到了西元前一世紀羅馬時期的修辭書如安托尼斯(Marcus Antonius)的手冊、作者不詳的《致赫拉尼斯的修辭書》(Rhetorica ad Herennium)及西賽羅的《論論點形構》(De Inventione)時，修辭已大致成為一完備系統完整的從希臘人手中傳承給羅馬人，而能全面書寫及觀照該系統的首部拉丁鉅作為西元一世紀昆體良(Quintilian)之《演說家之養成》(Institutio Oratoria)(Calboli and Dominik 4)。交付給羅馬的，另外還有補強論點形構的提問理論(stasis theory)，旨在形構論點前的問題確認，以期收更佳說服之效，此理論由西元前二世紀的希臘人赫馬格拉斯(Hermogoras of Temnos)創制(Kirby 14; Kennedy 1972: 117)。在傳承當中，對於修辭的討論顯然是技術層級的，關於其知識性或道德性的思索較少或僅是名義上的，亞式所論之修辭推論更是微乎其微，修辭系統至此已與哲學脫勾。

西賽羅與此傳統的關聯可從兩方面說明，即其於學習與成熟階段分別書寫之修辭論述。前文提到的《論論點形構》便是他在十七歲寫成的，在書名上已清楚的表

達是關於論點形構的修辭論述，他後來在《理》述及這本年輕時期的作品時，稱其不成熟：「概略」且「不深刻」(1.5)，正因為它比較像是學習筆記的整理，未注入個人的批判觀點。不過，《論論點形構》和《致赫拉尼斯的修辭書》卻同為西方中世紀至文藝復興瞭解、研習修辭的主要範本，而基於受注目的時間點，卡馬戈(Martin Carmago)將前者名為「舊修辭」(*rhetorica vetus*)、後者名為「新修辭」(*rhetorica novus*)(99)。至於成熟階段，西賽羅最完整、全面的修辭作品要算是本文的焦點《理》，其特別之處在於：雖然當時的修辭書似圍繞在修辭的五大科目，實則偏重在論點形構，而其論點形構，多以論點編排視之，且訂定死板的模式，彷彿照公式走便可得一精采演說；西賽羅做的是，完整鋪陳五大科目，並強調演說家運用此五大科目的能力——技術仍得就人的能力和就經驗判斷開展。況且，西賽羅更指出演說家須備有哲學的知識，而企圖將修辭傳統在某種程度上回歸到柏拉圖主義，但僅僅是智識上的，很難說有道德的或邏輯的考量。他的其他修辭論述則為特定目的或主題書寫，例如《修辭中的編排》(*De Partitione Oratoria*)探討論點編排，《布魯特思》(*Brutus*)及《演說家》(*Orator*)為他自己的亞洲語風辯護(針對雅典語風)，《最佳的演說家》(*De Optima Genere Oratorum*)論及演說家的三種功能，而《論題》(*Topica*)申論修辭與哲學可在論點形構上接合，凡此皆不若《理》完整。

在這些修辭作品之後，西賽羅由於在政治生涯上的機會渺茫及其女兒病逝，而書寫了一系列的哲學討論。就其與修辭的對位而言，他主要的旨意為知識終究是修辭的根柢，但從文本仔細審酌，兩者的關係總是並置的。²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他的政治生涯仍存有盼望時，他作品中的「修辭之顯」隱喻了他對政治的某種樂觀，而於其哲學論述中的「修辭之隱」並不代表他放棄修辭能淑世的想法，應該是說哲學為修辭的換喻，以一種迂迴的方式帶出他終身的信仰。以下將討論西賽羅的生涯如何連結此信仰，以及該信仰於《理》的展現。

三、西賽羅的生涯與理想的演說家

西賽羅的生涯在前期極其輝煌，他以一位「新人」(*novus homo*)之姿(May and Wisse 8)，竟能在傳統的羅馬共和政治中於每個重要官位最低年齡限制下，一路以最輕的年紀獲選該位階，即從財務官(*quaestor*)、行政官(*aedile*)、民選官(*praetor*)到執政官(*consul*)羅馬人眼中的「榮耀之路」(*cursus honorum*)(Wood 48)。但他是一位新人，並不表示他從平民起家，他的新是因為他屬於羅馬騎士(*equestrian*)貴族層級的地方鄉紳，有別於羅馬的元老階級(*senator*)貴族，他們對「外來者」有著一定程度的勢利(Wood 42)。無論如何，西賽羅的發跡源於他的演說能力。西元前70年，時任

² 可參考拙著“Rhetorical Ventriiloquism: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alectic and Philosophy in Cicero’s *Tusculan Disputations* and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對於西賽羅的哲學討論《圖斯庫蘭的爭論》(*Tusculan Disputations*)中哲學-修辭關係的分析。

財務官的他，打了一場「壯觀的訴訟」，成功的以敲詐、勒索的罪名審判西西里前任的總督維瑞斯(Verres)，自此聲名大噪，西賽羅的名字也因此和「最佳答辯人」畫上等號(May and Wisse 8)。《理》的序言便反映了因其修辭技能而仕途順遂的意氣風發，但也同時隱含了因該技能而導致其仕途被迫中斷的複雜情緒。原來，西元前63年在他登上羅馬最高政治位階執政官之際，亦面臨卡提里內(Catiline)的謀叛，隨後他成功說服元老院(Senate)在未審判的情形下處決他的黨羽。問題是，從法的觀點，元老院為一「諮詢組織」(advisory body)，不能立「法」(*leges*)，僅能有「決議」(*senatus consulta*)，而在憲法體例上，元老院卻又是各官員敬重、且在重要事項上請益的對象(Wood 23)。西賽羅即仰仗元老院的精神領導地位，以維護羅馬權威之名，壓制可能損害此權威的反對勢力。他所招致的政敵，再加上他拒絕加入由凱薩(Caesar)、龐貝(Pompey)及馬可克拉賽思(Marcus Crassus)組成的同盟，導致他在西元前58年被放逐。

放逐隔年，西賽羅被召回，但他見政治情勢仍受上述三人同盟的挾持，而對共和的處境憂心忡忡。稍後於西元前55年，他寫下了《理》，算是對政治危機的一項回應，這也是他第一本正式的修辭論述：為文的旨趣不難想像，亦即他將自身經由修辭走上「榮耀之路」的成功經驗，投射於書中的理想演說家之形象，並希望透過此演說家的降臨，能對羅馬產生救贖作用。當然，透過該理想形象，西賽羅欲以之反喻當代修辭的軟弱無力，或者是其根本走錯了方向。但總之，修辭，或說審議修辭，的確在羅馬社會扮演著政治上運籌帷幄的角色，在一個像是羅馬仍以口語溝通為主的社會，有效的演說不管是在元老院或各式議會都能左右決定的促成。特別是在正式投票前的「公共集會」(*contiones*)中，當演說者面對的可能是「難以駕馭」且有「暴力傾向」的平民百姓時，能運用修辭說服他們可謂是一大能耐(May and Wisse 4-5)。再者，羅馬動盪的政治情勢也使得法庭修辭相當重要，因其關係著公民審判，而審判極有可能被當成拉攏親近或剷除異己的政治工具。是以，其中牽涉到羅馬社會兩種主要網絡的建立，一為「朋友關係」(*amicitia*)，強調忠誠與合作，一為「服務關係」(*clientele*)，強調互惠與保護(Wood 28)。兩者皆可透過法庭辯護得到加強，而進一步在政治上施力。對於擁護「祖先慣習」(*mos maiorum*)的西賽羅(Long 38)來說，這些網絡恰為元老院鞏固其控制的必須手段(Wood 28)。如此，不管是在個人或國族層次，修辭對他極具象徵意義，他的理想演說家因而具體表徵羅馬人的精神領袖——但我們知道此精神的特質是傳統的、貴族的、權威的。

茲引《理》第一部中克拉賽思對演說家及其大能的歌頌來說明西賽羅對於羅馬共和危機產生的空缺所投射的英雄演說家的想像，並結束這一小節：

我認為沒有什麼比能夠經由話語掌控人心、贏得他們的意向、並教他們往哪走就往哪走更令人欽佩的能力了。就是這種能力，也只有這種能力，曾經繁榮興旺，且在每個自由的國度裡引領風潮——特別是那些安靜、平和

的社會裡。在茫茫人海中，如果有那麼一個人，他自己或伴隨少數其他人，能夠有效施展對大家而言是來自上天的大能，還有什麼是如此具有力量的呢？(1.30-31)

在此，修辭化身為人，也就是演說家，他以其天賦而非修辭教條用言語支配人心，間接反應西賽羅當世渾沌之不可抑。再者，演說家鶴立雞群的救世主視野帶出西賽羅的菁英主義，與其對共和傳統、權威的立場相連結。

四、《理》：在回憶中建構及蘊含之傾軋

對於現實中的空缺，西賽羅認為透過演說家的大能可以加以彌補，而其途徑為追憶克拉賽思與安托尼斯，以及蘇格拉底。前二者為他學習階段時(大約是西元前95年)的修辭學教師，他們在當時是演說大家，因此將之設定為《理》主要的與談人，透過他們暢談修辭的完形，等於是對他們表示敬意(特別是對克拉賽思)。但先不論《理》的三部對話是否真實或虛擬，此等緬懷暗示的是一段退化史，當西賽羅在第一部的序言中表示無法尋得在演說上有所成就的人(1.6)，而在其後的對話裡不斷烘托出克拉賽思的傑出時，對應的正是當代的失能。其次，緬懷的時間點設定為西元前91年，克拉賽思於該年逝世，同年羅馬開始陷入混亂，例如該時發生的「同盟戰爭」(Social War)，為羅馬的義大利盟友因要求公民權未遂而戰(Wood 29; Wilkins 5)，以及後續80年代的內戰與政爭等等。³這在第一部及第三部的序言(1.3&3.8)皆有指涉，並連結至西賽羅自身的政治處境(1.2-3)，代表的無疑是個人在歷史中尋找參照，不僅尊古，更在對照過程中，不言明的將自己類比為克拉賽思，而暗示他具修辭大能以淑世？西賽羅的追憶恩師因此可反向的推論出他仍對羅馬共和懷有一線希望——這個希望正是建立在他的自我形塑。

如深究前述之修辭大能，《理》不斷反覆申論的，其實就是演說家必須將話語(*verba*)與知識(*res*)作一結合的議題，此呼求因而形成該文本的基調。在第一部序言中西賽羅列舉演說家的特質時，首要即是必須博學多聞，避免「空洞」的話語(1.17)，舉畢後，他又在對話即將開始前，重申此點，以免修辭落入「幼稚的口語練習」(1.20)，可見其重知之心切。當然，這個議題就思想傳統而言並不新穎，但是就西賽羅的當代修辭潮流來說，《理》在這方面的確是獨樹一格，因為知識指涉的是哲學討論，而哲學在羅馬人的觀感中不過是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的囈語而已。他之所以重哲學，可能與他個人對哲學的熱誠有關，他還曾在年輕時前往希臘壯遊，且在哲學師承上，隸屬新學院(New Academy)；然而本文認為，西賽羅舉哲學大纛，較有可能關係著他

³ 隨著義大利半島漸趨羅馬化，文化上的融合引出政治整合呼求，而有因爭取羅馬公民權的「同盟戰爭」(Steel 77)。

的共和傾向，要知道，他是在共和面臨敗壞的情況下寫成《理》的，而對共和的尊重涉及哲學中對於倫理的討論及訴求。無論如何，他當代的修辭教學不傳授也不企圖研習哲學(1.52)，只講究制式的規則(2.82)，無視人在實際經驗裡主動感知，就當下所具備的知識基礎及論述能力尋求最佳解答。不難想像克拉賽思在述及標準的修辭手冊內容時，敘述客觀但不具生命力，彷彿機械操作(1.134-146)，而於該部分結束時說道，雄辯不是「技藝的產物」(the offspring of art)，卻是「從雄辯歸納而來的技藝」(art of eloquence)(1.146)。這也是為什麼《理》一書在標題上清楚標誌「人」的屬性，並非從科目的角度出發，於此，《理》也與西賽羅的第一本修辭書《論論點形構》大有不同。

但是，西賽羅對理想演說家形象的建構，更追憶了哲學的精神領袖，蘇格拉底。如前所述，《理》由三部對話組成，並從對談中勾勒理想的演說家該具備的特質，但對話的形式不簡單，因其向來是哲學所慣用的表述模式，就這點而言，《理》對西賽羅的當代應是驚世的作為。⁴從文本結構來看，則是清清楚楚的利用回憶指明承繼希臘哲學的意圖，再進一步利用之增強話語—知識連結的主題。主要是在第一部對話開始前，另一(次要)與談者史該摩拉(Scaevola)向克拉賽思說道：「既然您這邊有一株懸鈴木(plane tree)，那我們為什麼不學學蘇格拉底在柏拉圖(Plato)《費德魯斯篇》(Phaedrus)中臥躺在懸鈴木下暢談呢？」(1.28)須知，該對話的主旨便是好的修辭奠基於演說者必須熟稔所述之知識(259E)，因此《理》的基調至此明顯的透過媒合兩段回憶，並使之互為鏡像而成。克拉賽思於此扮演著重要角色，他除了是主要議題的提出人，在對話中持續辯護之，西賽羅於《理》的討論題目安排更讓他名符其實的體現標題中的理想演說家。原因是，隨著主題在第一部的提出，在第二部中與談人決定逐一檢視修辭五大科目，安托尼斯便將其中的風格塑造及發聲操作分配給克拉賽思在第三部中討論。這兩個科目與其他三個相比，較屬於表達面，所傳達的意涵為：如果他是《理》的核心人物，則在形象的塑造上，他必須越靠近產出面越好，越能與經驗世界結合，較技術較理論的就留給安托尼斯討論。更重要的，由他來探究風格塑造再適合也不過，因為他是對話中話語—知識連結的創制者，他怎麼談風格即是需要觀察的重點。於第三部進入該主題後，克拉賽思首先申辯話語—知識連結的重要性，以及此連結原為哲學討論中萬物本為一的概念(3.19-24)，接下來在3.37b-38才談到風格的四種特質(正確的拉丁文、清晰的拉丁文發音、出色、合宜)。但於分項解釋的過程中，克拉賽思在第二項結束後嘎然而止，離題但其實是回到這個題目的破題處，再次申論話語—知識連結，並指出此二者最初本來即為一體(3.56-62)，而強調，是蘇格拉底的雄辯導致話語與知識的「分家」(rupture，於拉丁文：舌頭與心的分離)(3.60-61)；於3.63-68，簡介當今哲學派別與演說家；於3.69-73，重談話語—知識連結及蘇氏為破壞此連結者；於3.74-81，泛談哲學家及理想的演說

⁴ 《理》也是現存第一部的拉丁文對話作品(Fantham 49)。

家；於3.82-90，提到希臘人確有不足，但其知識仍值得學習；爾後，方真正進入風格的後二項目：出色與合宜。這種編排顯示，克拉賽思想藉此沖淡談論此兩項目時的技術性氛圍，暗示演說家使用再如何出色的句構或用字，仍得從知識出發。甚至，於3.104-110，提到所謂的「真正」的出色，在於問題形成，而於3.111-119，他即從哲學的視角分類一般性及特殊性問題——可以說，克拉賽思論風格的策略為架空之，回到以人為思考主體的內涵。此回應了《費德魯斯篇》懸鈴木場景下好修辭純以知識為宗的討論，對於風格的架空也正如蘇氏透過費德魯斯(Phaedrus)顛覆詭辯家萊西亞斯(Lysias)的話語。因此，西賽羅的追憶蘇氏，可說是再現了象徵知識場景的美妙之地(*locus amoenus*)。

不過，上述兩段回憶的互聯，卻牽連了兩種互為扞格的記憶模式。《理》所爬梳之記憶模式為修辭五大科目之一的演說記誦，並藉由西摩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的小故事，說明序列於記誦的重要性，而達致的方法為將論點與方位(*locality*)的相對位置結合，空間的序列因此成為尋找論點的主要線索(2.350-360)。演說家在陳述論點時，即蒐索腦中的空間地圖及各方位所連結的素材，以確切精準的產出備好的話語材料，同時在臨時的狀況中，也能根據當下，於該地圖中尋得所需論點。另一方面，《理》的哲學對話形式及對《費德魯斯篇》的召喚，暗示蘇氏尋求真理的方法：辯證，其細節不在此詳述，但此辯論模式主要是從定義問題出發，逐步點出及革除與談者自身在觀點上的矛盾。本文要特別說明的是，辯證法之效度在於其有一重要前提，為蘇氏在《邁諾篇》(*Meno*)提出之靈魂的不朽(81B)，此主要是回應邁諾(*Meno*)的詭辯提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皆無尋求的必要)；他解釋道，由於靈魂的不朽，個體其實已知曉事物的樣貌及道理，雖然會遺忘，但只要透過回溯法(*anamnesis*)便可點醒與談人已經具備的知識(81C-D)。辯證法即是回溯的根本途徑。⁵綜合觀之，前者記憶模式的符號效應為能指(*signifier*)導向，著重在外緣的指涉，表意的途徑隨機、重果效，後者則是所指(*signified*)導向，著重在內涵的指涉，表意的路徑單一(唯靈魂是問)、重正確性。言說主體自身或與客體間的一致性在當中清楚的是一根本的判別標準，而因此文本表層回憶的並置在表意的路徑實際上是互卸的。

此外，《理》中修辭主體與客體的一致性於邏輯上近似亞式的修辭推理，可是一來西賽羅對亞氏的挪用僅有論點形成中的三種形式(*logos*、*ethos*及*pathos*)，二來縱使連結至修辭推理，他對情(*pathos*)的認知也可能導致不同的詮釋，極為複雜，將另文論述。

五、結語：評估西賽羅的理想演說家圖像

西賽羅藉由回憶拼圖設定其理想演說家的圖像，根本上是要與當代強調的修辭

⁵ 這是為什麼巴瑞里認為「辯證是靈魂間的相遇」(7)。

教學作一區別，重新將焦點置放在人的主體性感知及自身調度各種能力的特質，再者，此圖像的底蘊為蘇格拉底式的知識基模，凡此皆說明《理》在其時是有創制性的。⁶然而從文本的表意層次，卻又有些細微處隱含西賽羅不斷的在思想上合縱連橫，以致我們有必要給予該圖像一些限制及開放的空間。例如，雖然《理》在形式上是哲學對話，但其中的討論顯現的是「闡述」而非「蘇氏的尋求」(Wilkins 4)，因此無辯證的元素；何況，演說記誦的表意不僅外緣於回溯術，其與客體的一致性訴求亦體現在克拉賽思作為主要與談人的身分認同上——對話開始前，他特別提醒在場的人士，他是「以穿著寬外袍的人」論述以下的觀點的(1.111)。此處的寬外袍極具象徵意義，它代表著羅馬人，也代表著羅馬公民在社會、在政治以修辭開展的階段，其中的在地連結，因此呼應了演說記誦中論點與空間需結合的技巧。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留意到，克拉賽思與此保持著模糊的距離，因為關於記誦的討論由安托尼斯負責。況且，於論及理想演說家難尋及雄辯術之宏偉難以駕馭時，克拉賽思承認其艱難，但他也說，唯有這般討論，才能獲知演說家值得稱讚的特質(1.118)，才知道什麼是該追求的。如就隆翁(A. A. Long)討論西賽羅《演說家》當中提及柏拉圖式意念與雄辯之關聯，即：個別的演說不完美的複製了只能由心智覺知的理想演說(47)，或可推得，西賽羅於此隱含的是現象模擬意念的邏輯，追求原型方知真實為何，而因此又回到蘇式的框架中。在這些種種獨特的「合成」中，有延續，有斷裂，矛盾的因子更是並存，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圖像是西賽羅開給身陷危機的羅馬共和的一劑良方，不管怎樣搭配，有療效就好。

⁶ 當中要特別注意是，《理》並未如柏拉圖《高爾吉亞篇》強調演說家的道德人格，如此一來，不難想像《費德魯斯篇》能成為西賽羅著述《理》的理由(這兩篇為柏拉圖探討修辭的主要對話)，因其著重在演說家的知識學養，而《勾其亞篇》旨在挑戰演說者的道德性，同時也於此分離了話語與知識。

引用書目

- Aristotle. *Art of Rhetoric*. Trans. John Henry Freese. LCL 193. London: Harvard UP, 1994.
- Barilli, Renato. *Rhetoric*. Trans. Giuliana Menozz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c1989.
- Calboli, Gualtiero, and Dominik, William J. "Introduction: the Roman *Suada*." *Roman Eloquence: Rhetoric i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Ed. William J. Dominik. London: Routledge, 1997. 3-12.
- Carmago, Martin. "Rhetoric." *The Seven Liberal Arts in the Middle Ages*. Ed. David Wagner.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3. 96-124.
- Cicero. *On the Ideal Orator (De Oratore)*. Trans. James M. May and Jacob Wisse. Oxford: Oxford UP, 2001.
- . *On Invention (De Inventione)*. Trans. H. M. Hubbel. LCL 386. London: Harvard UP, 1949.
- Fantham, Elaine. *The Roman World of Cicero's De Oratore*. Oxford: Oxford UP, 2004.
- Kennedy, George. *The Art of Rhetoric in the Roman World 300 B.C.-A.D.300*.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2.
- . *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London: Croom Helm, 1980.
- Kirby, John T. "Ciceronian Rhetoric: Theory and Practice." *Roman Eloquence* 13-31.
- Long, A. A. "Cicero's Plato and Aristotle." *Cicero the Philosopher: Twelve Papers*. Ed. J. G. F. Pow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37-61.
- May, James M., and Jakob Wisse. "Introduction." *On the Ideal Orator*. Oxford: Oxford UP, 2001. 3-55.
- Olmsted, Wendy. *Rhetoric: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
- Plato. *Euthyphro, Apology, Crito, Phaedrus*. Trans. H. N. Fowler. LCL 36. London: Harvard UP, 1999.
- . *Laches, Protagoras, Meno, Euthydemus*. Trans. W. R. M. Lamb. LCL 165. London: Harvard UP, 1999.
- . *Lysis, Symposium, Gorgias*. Trans. W. R. M. Lamb. LCL 166. London: Harvard UP, 1996.
-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4 vols. Trans. H. E. Butler. LCL 124. London: Harvard UP, 1996.
- Rhetoric to Herennius (Rhetorica ad Herennium)*. Trans. Harry Caplan. LCL 403.

London: Harvard UP, 1999.

Steel, C. E. W. *Cicero, Rhetoric, Empire*. Oxford: Oxford UP, 2002.

Tsai, Jen-chieh. "Rhetorical Ventriloquism: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alectic and Philosophy in Cicero's *Tusculan Disputations* and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4.2(2011): 177-212.

Walker, Jeffrey. *Rhetoric and Poetics in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P, 2000.

Wilkins, Augustus S. Introduction. Cicero. *De Oratore I-III*.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02. 1-72.

Wood, Neal. *Cicero'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Berk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8.

蔡仁傑，銘傳大學應英系助理教授

電郵：d93122004@ntu.edu.tw